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tudies
會計審計論叢，第 16 卷第 1 期，2026 年 6 月
第 25-58 頁

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之關聯

王炫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

黃馨儀*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計量理論研究中心

連志剛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收稿日：2025 年 6 月 9 日；接受日：2025 年 12 月 23 日

摘要

本研究探討臺灣上市櫃企業公司治理機制與訴訟風險管理之關聯性，研究期間涵蓋 2010 年至 2018 年。根據人工蒐集年報資訊彙整企業是否將訴訟義務認列為費損或負債準備作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之衡量指標，公司治理變數則包含具財會背景董事、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及公司治理評鑑等級。實證結果顯示，具財會背景董事、經營團隊規模較大、經營團隊持股比例較高、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較高及公司治理評鑑等級較佳者，其訴訟風險管理顯著較佳。進一步分析發現，家族企業及盈餘品質會干擾公司治理機制與訴訟風險管理之關係。本研究補足過去文獻鮮少探討不同情境下公司治理機制對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對主管機關與實務界強化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具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公司治理、訴訟風險管理、IAS 37、財報品質、家族企業

* 通訊作者。連絡電話:(06)2757575#53416；通訊地址:701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 號(光復校區會計系)；E-mail:z11302013@ncku.edu.tw。作者衷心感謝戚務君教授(期刊總編輯)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寶貴建議。黃馨儀感謝行政院國科會(前科技部)提供之研究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TC 113-2628-H-006-003-MY2)以及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國立臺灣大學計量理論與應用研究中心研究經費(編號 114L900201)。文中若有疏漏與錯誤，均由作者自行負責。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tudies
Vol. 16 No. 1, June 2026
pp.25-5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Hsuan-Pin Wang
Depart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Hsin-Yi Huang*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Research in Econometr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h-Kang Lien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ceived 9 June 2025; accepted 23 December 2025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in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over the period 2010 to 2018. Based on manually collected annual report disclosures, we identify whether firms recognize litigation obligations as expenses or provisions and use this as an indicator of poor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qua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include the presence of directors with accounting or finance backgrounds, CEO duality, the size and ownership of the management team,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alu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firms with directors having accounting or finance backgrounds, larger management teams, higher management ownership, greater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wnership, and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ratings exhibit significantly better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is moderated by family ownership and earnings quality. This study fills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by exploring how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fluence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 offering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s and practitioners seeking to strengthen corporate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Key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Litigation risk management; IAS 37;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Family firms

* Corresponding Author: Hsin-Yi Huang, Department of Accountancy, National Cheng Kung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City 701, Taiwan, ROC; z11302013@ncku.edu.tw. The authors sincerely thank Professor Wuchun Chi (Editor-in-Chief) and two anonymous reviewersfor their valuable comments and onstructive suggestions. Hsin-Yi Huang gratefully acknowledges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 formerl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Grant No. NSTC 113-2628-H-006-003-MY2),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in Econometr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Grant no. 114L900201, from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The featured Areas Research Center Program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in Taiwan.

壹、緒論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係指一套指導及管理企業之機制，協助企業經營者落實其責任，並保障股東之合法權益及兼顧各利害關係人之利益[1]。近年來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架構逐漸受到各方重視，其中「治理構面」強調企業應落實董事會監督功能、提高資訊揭露品質與健全內外部控制等制度，藉此回應外部利害關係人之期待(Eccles et al. 2014)。我國主管機關亦持續推動強化公司治理之政策。例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 2013 年起實施三階段公司治理強化藍圖，其中 2020 年提出「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並於 2021 年起執行三年期改革計畫，強調落實董事會職能、強化資訊揭露、加強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導入盡職治理及深化永續治理等五大構面共 39 項具體措施，反映主管機關對於提升公司治理之重視，也說明公司治理對現代企業經營及與國際接軌係屬不可輕忽之關鍵。過去學術文獻亦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於提升財報品質(Choi et al. 2013)、降低資本成本(Ashbaugh-Skaife et al. 2006)、減少發生舞弊(Beasly 1996; Chen et al. 2006)或負面事件(Treepongkaruna et al. 2024)之可能性。

相較於過去文獻，本文聚焦於公司治理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間的關聯。企業訴訟風險被視為影響企業價值之重要因子。當涉及法律訴訟時，除未來潛在賠償損失外，也可能被視為經營失序所造成之惡性後果，進而對企業市值及聲譽造成負面影響。Skinner (1994)指出，訴訟相關揭露對股價造成負面影響，表示投資人預期訴訟風險將減少企業未來現金流量及對企業誠信產生疑慮。

關於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兩者間的關係，本文分別從內部控制、資訊不對稱及代理理論等觀點提出預期。首先，良好的公司治理可強化企業內部的監督機制，有助於建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進而達成法規遵循之目的(COSO 2013)。根據 COSO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於 2013 年提出之內部控制架構指出，企業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能有效確保管理階層與員工遵守相關法律規範，透過內控強化法規遵循(legal compliance)，進而直接降低企業因違規行為而被提起訴訟或後續判決敗訴之可能性。此外，從代理理論的觀點出發，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指出公司治理機制可有效抑制管理階層的投機行為及減少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這進一步促使企業在財務報導與資訊揭露時更為透明(Healy and Palepu 2001)，降低投資者因公開資訊不當而被提起訴訟或後續敗訴的風險。另一方面，Core et al. (1999)亦提出，健全的公司治理架構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agency cost)，避免企業內部因利益衝突而產生的決策失當與法律風險。

[1] 金管會證期局網頁資料：https://www.sfb.gov.tw/ch/home.jsp?id=882&parentpath=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上述觀點外，利害關係人理論(stakeholder theory)強調企業與各利害關係人之良好互動。為滿足利害關係人期待，企業會建構適當之公司治理機制，進而減少潛在的利益衝突與訴訟風險(Freeman 1984)。而基於聲譽理論(reputation theory)的觀點(Fombrun 1996)，具備完善治理機制的企業為維護其聲譽，將避免可能導致負面形象之法律糾紛。據此，本研究預期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應呈現正相關。

本研究以 2010 年至 2018 年間我國上市櫃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應變數為公司層級之所有訴訟種類之訴訟案，當期是否將訴訟義務認列費損或負債準備之虛擬變數，藉以衡量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 [2]。當企業訴訟風險管理較佳時，企業被提起訴訟賠償或後續敗訴賠償之可能性將顯著較低，故較不可能認列實際賠償損失或負債準備；反之亦然。而自變數則包含具財會背景董事、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等公司治理變數，藉此觀察公司治理機制對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具財會背景董事、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品質呈顯著正相關，而公司治理評鑑等級越優秀時企業也較不可能認列訴訟相關費損或負債準備，支持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存在顯著影響。此外，考量家族企業本身存在特殊治理結構及盈餘品質與公司治理的交互影響可能影響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額外測試也進一步探討家族企業及盈餘品質是否對先前結論產生干擾效果，實證結果也確實發現不同情境下公司治理機制對訴訟風險管理之效果有所不同。

過往文獻多以產業層級或事前模型來衡量訴訟風險，例如 Francis et al. (1994a, 1994b) 以是否屬於高訴訟風險產業作為代理變數，僅能反映產業間的平均差異；Kim and Skinner (2012) 則建立一套事前估計模型，透過公司規模、股價波動及揭露行為等特徵預測公司遭股東集體訴訟的機率。本研究則與之不同，將「公司是否於當年度將訴訟義務認列為費損或負債準備」作為衡量指標，捕捉公司層級、事後面向的資訊，並涵蓋所有種類的訴訟案件。基於此，本研究將變數明確界定為「訴訟風險管理」，更能反映公司在面對訴訟過程中控制與應對訴訟損失的能力，而非單純的訴訟發生可能性，藉此釐清本文與既有文獻在研究主題與衡量方法上的差異。

本研究主要研究貢獻有以下三點：第一，本研究填補公司治理文獻對於法律風險管理之研究不足，過去鮮少文獻探討此兩者間的關係，本研究則發現具

[2] 訴訟所產生之義務的會計處理請參考第貳節內容。根據 IAS 37 公報，當未來潛在賠償金額無法可靠估計時歸類於或有負債，不一定代表訴訟風險管理較佳。然而，受限於根據公開資訊我們並無法確認其分類依據，故本研究選擇將該部分視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較佳組，此為本研究變數衡量上之限制。後續額外測試中本研究也將揭露或有負債組重分類至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組並重新測試，實證結果並未有重大差異。

臺灣人壽保險研究中心版

財會背景董事、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及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確實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有所影響，加強學術界針對公司治理對法律合規與相關風險管理影響之理解；第二，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家族企業及盈餘品質對研究議題之干擾，發現當企業為家族企業及盈餘品質較低時，公司治理機制對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強度有所差異，凸顯企業內部權力結構與資訊環境對治理成效的重要影響，亦可補強公司治理文獻中對治理機制效果異質性之討論。最後，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也可對主管機關及實務界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上提供重要實務參考。

本研究後續節次安排如下：第貳節為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第參節為研究設計，第肆節整理實證結果及其意涵，最後為研究結論及限制。

貳、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一、 訴訟義務之會計處理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針對訴訟所產生義務之會計處理，係規範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37,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後續簡稱 IAS 37)。IAS 37 將「負債準備」與「或有負債」加以區分。所謂負債準備，係指負債之金額與時點雖尚不確定，但同時符合下面三項條件者：1.來自過去事件而使企業負擔現時義務；2.清償該義務很有可能造成經濟效益流出；及 3.其金額能可靠估計(詳見 IAS37.14)。相對而言，或有負債係指 1.來自過去事件產生之可能義務，其存在與否依賴未來不確定事項發生或不發生加以證實；2.因過去事件產生之現時義務，但發生之可能性低於很有可能或金額無法可靠估計(詳見 IAS37.10)。除發生之可能性甚低外，或有負債須於附註揭露中說明。具體而言，若企業存在訴訟產生之義務時，若發生的可能性達到很有可能(probable)且金額能可靠估計時，應視為負債準備，並將該義務認列入帳。相對而言，若不符合負債準備之定義且發生的可能性大於極少可能(remote)時，應將該義務於附註揭露中說明；若發生的可能性低於極少可能時，則不得將該義務認列入帳或附註揭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2015)。常見負債準備及或有負債的例子包含未決法律訴訟、產品保固及除役成本(Schiff et al. 2012)。

早期許多研究以美國 SFAS 5[3]為研究對象，探討訴訟義務之會計處理之合適性及提供改善建議。例如，許多批評者認為 SFAS 5 給予管理階層高度裁量空

[3] 2009 年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將既有會計準則整併為 FASB Accounting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SC)，SFAS 5 相關內容目前規範於 ASC 450：Contingenc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使企業對相關決策具高度自主性，導致企業可根據自身利益去選擇性揭露或延遲揭露(Cen et al. 2018)。Desir et al. (2010)根據後續有重大賠償損失之樣本觀察，發現許多企業並未事先認列負債準備或適當揭露，顯示準則規範仍無法充分反映企業訴訟風險，故建議納入更多量化或風險評估之資訊。Hennes (2014)探討財報中關於訴訟產生義務之認列或揭露資訊是否具有用性，其研究結果發現，關於金額無法可靠估計及企業願意和解之揭露內容與發生之可能性及金額呈現正相關，企業選擇認列入帳及揭露對重大性之警示訊息則後續較可能發生重大損失，支持相關資訊有助於預測未來訴訟之實際情況。此外，Li (2023)利用 10-K 報告進行大樣本分析，發現即使整體 10-K 報告中針對訴訟有關揭露變化幅度有所下降(即偏向模板化內容)，但對於高私有資訊成本(proprietary cost)、高訴訟風險及採用非四大會計師之企業而言，訴訟相關揭露變化幅度反而有所增加，且相關內容能協助預測未來法律案件，說明這些企業仍會使用揭露傳遞攸關資訊給投資大眾。

此外，許多研究探討訴訟所產生義務之報導決策(視為負債準備而認列入帳；或視為或有負債而附註揭露)之決定因素與經濟後果。Chen et al. (2018)發現產業專精會計師能促使企業更早地認列訴訟相關之負債準備。Huang et al. (2024)則發現，當盈餘績效剛好僅達到分析師盈餘預測目標附近時，企業較不可能選擇將訴訟義務視為負債準備而認列入帳，而專精會計師與客戶重要性會對前述關係產生調節效果。Billings et al. (2021)發現當面臨與財報損益有關之訴訟時，企業會開始調整其報導決策引導市場大眾降低對未來盈餘績效之期待，藉此降低後續之訴訟成本。

二、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之關聯性

當企業涉及法律訴訟時，可能會對企業市值及品牌價值造成負面影響(Frost 1991; Skinner 1994)。我國實務案例中，宏達電曾被 APPLE 及 NOKIA 控告侵犯其專利權而面臨商品於海外市場被禁售之風險；2013 年日月光 K7 廠排放汙水汙染後勁溪，造成當日公司股價一度跌停；2014 年味全假油案涉及食品安全法，引發社會大眾抵制；2022 年博客來因簽署「假承攬、真雇傭」合約解雇服務 20 餘年的清潔員引發社會輿論譴責，這些案例皆可證明涉及不法爭議及其衍伸之訴訟風險將對企業造成各種負面影響。公司治理機制被廣泛認為能強化企業內部監督及決策品質，進而對企業營運與財務績效產生各種正面影響。例如，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於提高盈餘品質(Choi et al. 2013)、減少資金成本(Ashbaugh-Skaife et al. 2006)、減少發生負面事件之可能性(Treepongkaruna et al. 2024)等。而本文主要探討公司治理機制能否有效強化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進而減少企業認列訴訟相關費損及負債準備之可能性。

關於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之關聯性，過去學術文獻較少直接探討。本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分別從內部控制、資訊不對稱、代理理論、利害關係人理論及聲譽理論等多重觀點進行推論。首先，良好的公司治理會透過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等治理機制，建構適當的內部控制，以確保企業日常營運順利。COSO 於 2013 年修訂的《內部控制－整合性架構》(Internal Control – Integrated Framework)提出內部控制三大目標：營運、報導及遵循目標。其中，遵循目標為確保企業活動符合法規及契約內容，強調合法經營與風險控管，避免有非法事項及訴訟風險。此外，該框架亦指出內部控制涵蓋五大要素，其中「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強調企業應定期識別與分析潛在風險，並評估其對組織達成目標的影響。企業若能有效執行風險評估流程，將有助於及早辨識諸如財務報導不實表達、違反法規或契約、或潛在訴訟等風險，進而採取預防性措施，減少企業因違法或疏失而面臨法律訴訟或後續敗訴之可能性。Zhang (2020)利用中國 A 股樣本分析，發現內部控制品質與捲入訴訟案件數及訴訟支出皆顯著負相關，表示內部控制可強化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其次，從代理理論及資訊不對稱理論討論，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指出公司治理機制可減少管理階層之投機行為，避免企業內部因自利誘因而產生的決策失當，進而減少訴訟風險(Core et al. 1999; Huang et al. 2024)。而公司治理促使企業去自願性揭露攸關資訊，提高公開資訊之透明度(Healy and Palepu 2001)，降低企業因資訊不透明而延伸之訴訟風險。Bushman and Smith (2001)提出財務報導透明度與公司治理密切相關，Armstrong et al. (2010)也指出資訊透明度可降低代理成本，並提升債權人的監督效能，故透明的揭露可降低外部人士誤解進而減少潛在法律紛爭與訴訟。Houston et al. (2019)以三項造成訴訟風險有所變化之司法改革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所屬訴訟環境有所變動時會改變其自願性揭露政策，與 Healy and Palepu (2001)預期自願性揭露可抑制訴訟風險及代理理論對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揭露誘因之互動皆相互呼應。因此，公司治理機制完善使企業資訊較透明且代理成本降低，有助於企業控管其訴訟風險。

利害關係人理論(Freeman 1984)提出企業做各項決策時，應不僅只考量到股東(shareholder)利益，也要兼顧所有與企業相關之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近年來 ESG 已成為全球各組織之轉型目標。三大構面中的治理構面直接與健全公司治理機制相關，且 ESG 也特別重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立場。當企業更重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時，企業與這些利害關係人之訴訟風險應顯著降低。據此，對於較為重視 ESG 的企業而言，公司治理機制可能更加健全而訴訟風險管理也應較強，兩者間應呈現正相關。聲譽理論(reputation theory)認為企業聲譽是綜合反映利害關係人整體評價之無形資產。Fombrun (1996)指出企業有誘因建立良好聲譽，進而增加市場對品牌之信賴度。而企業也會盡量不涉及非法事項或爭議性行為，避免品牌形象受到傷害。因此，對於重視本身聲譽之企業而言，更可能健全公司治理機制以符合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需求，也較不易涉及非法事項或訴

臺灣大學圖書館

訟中。Badawi and Partnoy (2022)提出 ESG 表現較佳的企業較少遭遇股東訴訟，而且案件更容易被駁回。Treepongkaruna et al. (2024)發現董事會規模與 ESG 負面消息呈顯著負相關，印證治理機制有助於控管潛在之訴訟風險。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預期公司治理機制越完善，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將顯著加強。據此，本研究建立研究假說：

H1：在其他因素不變下，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有關。

過去公司治理文獻從董事會特質、經營團隊特性、外部監督機制(如債權人、機構法人、少數股東及會計師)等不同角度來觀察企業公司治理機制，本研究則以具財會背景董事、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及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等角度觀察。首先，董事會成員若具備財會背景，則較能理解財報內容及提升資訊透明度，進而提升公司財報之即時性與盈餘品質(Abernathy et al. 2014; Krishnan and Visvanathan 2008)。而此類董事能強化對管理階層的監督或建置適當的內部控制，有助於預防財務報導失誤或揭露不實，從而降低因資訊不實而引發的投資人訴訟風險。此外，具財會背景董事通常服務過數家企業，累積對不同產業及規模之企業如何因應合規風險與法律爭議之廣泛經驗，故對潛在的訴訟風險能有更敏銳的判斷，並提供更有效的因應建議。這使得財會專家董事不僅能協助降低公司被起訴的風險，也能降低公司在訴訟過程中的不利結果，進一步加強企業的訴訟風險管理。而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 Duality)時，權力過度集中降低了董事會對經營團隊的獨立監督(Jensen 1993; Finkelstein and D'Aveni 1994)，在此情況下，CEO 更可能因自利誘因而隱匿或延遲揭露特定負面資訊(Gleason and Mills 2002; Hennes 2014)，並採取短視近利或高風險的經營策略(Core et al. 1999)，從而提高企業面臨訴訟及後續敗訴之可能性。Dechow et al. (1996) 也發現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較可能因涉及盈餘操縱而被 SEC 調查。

經營團隊負責執行董事會所決議之各項決策及監督企業日常營運，Bu et al. (2024)發現較穩定之經營團隊有助於強化內部控制與降低代理成本，造成企業訴訟風險顯著下降。本文則分別探討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對訴訟風險管理之可能影響。Chemmanur and Paeglis (2005) 的高層理論提出大型管理團隊具備多元知識背景，藉由快速及豐富的資訊交換，能有效提升決策品質與問題解決能力。Haleblian and Finkelstein (1993)也發現在環境高度不確定時，大型經營團隊能提供較多元的觀點與資訊，有助於提升企業績效。當經營團隊通常多位高階主管共同參與，理論上可提升決策多元性與風險評估的全面性，有助於加強企業訴訟風險管理。相對而言，Hambrick (1995) 指出，當團隊規模過大且缺乏有效溝通時，易造成衝突增加及決策效率下降，故可能間接增加企業管理難度與法律風險。因此，經營團隊規模較大是否屬於較優之公司治理機制並無一致預期，

臺灣會計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本文納入實證模型觀察其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而經營團隊持股比例是衡量其與企業利益一致程度的重要指標。根據利益收斂假說(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當經營團隊擁有較多股權時，其財務利益將與股東更密切連結，有助於減緩代理成本與投機行為(Jensen and Meckling 1976)。過去文獻也發現經營團隊持股較高時代理成本較低(Ang et al. 2000)，企業也傾向採取較保守之財務結構以降低風險承擔(Moh’d et al. 1998)。因此，持股誘因可促使經營團隊更關注長期價值與公司聲譽，當經營團隊持股比例越高時，預期其更有動機落實法律遵循與資訊透明化，促使企業減少導因於訴訟之潛在損失。相對而言，利益掠奪假說(conflict of interest hypothesis)主張，當經營團隊持股比率較高時，可能憑藉其控制力從事自利行為，弱化公司治理的監督功能。Jensen and Ruback (1983)指出高持股之經營團隊更可能採取反接管行為(anti-takeover behavior)以鞏固自身地位，造成企業訴訟風險遽增。Fan and Wong (2002)亦表示控制權高度集中會降低盈餘資訊內涵，反映控制者基於私利而不願將資訊透明化。李馨蘋與莊宗憲(2007)發現內部人持股比例愈高時公司經營績效較差。廖益興與楊清溪(2007)發現對家族企業而言，經營團隊持股比率與財報品質負相關。據此，經營團隊持股較多是否屬於較優之公司治理機制同樣並無一致預期，故本文納入實證模型觀察其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

其次，機構法人投資者具有資訊優勢與監督誘因，被視為公司外部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高機構法人持股可強化對管理階層之約束，促使企業重視資訊透明與法規遵循(Bushee and Noe 2000; Ajinkya et al. 2005)，與利害關係人理論或聲譽理論預期相似。Cheng et al. (2010)發現機構投資者作為主要原告時勝訴的機率與和解的金額皆較高，且被訴企業後續治理機制有較明顯之改進。Pukthuanthong et al. (2017)發現短期機構投資者更可能藉由事後訴訟來監督投資標的，而長期機構投資者則傾向進入標的內部監督，這些研究證明機構投資者於公司治理扮演重要角色。林穎芬等(2018)也發現主動(被動)機構投資者持股會抑制(加劇)企業從事關係人交易。整體而言，本研究預期機構法人持股將強化企業訴訟風險管理。

最後，僅從單一個別變數可能無法觀察公司治理之全貌，本研究也採用公司治理評鑑等級作為公司治理之綜合性指標，藉此觀察其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公司治理評鑑指標自 2014 年起由證交所與櫃檯買賣中心共同委託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該評鑑參考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公司治理原則設定「維護股東權益與平等對待股東」、「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提升資訊透明度」及「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四大構面並分別設定指標，每年針對符合資格的上市櫃公司進行測試並公告其等級。過去研究曾探討該制度推動對整體企業盈餘品質之影響(薛敏正等 2017；劉福運等 2018)，而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Wu et al. 2020; Huang and Wang 2023)以該評比結果作為公司治理機制之代理變數。

參、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本研究訴訟風險管理品質優劣係根據企業當期是否將訴訟義務認列費損及負債準備來判斷，資料來源係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企業年報內容人工蒐集整理，相關流程請參閱附錄。受限於該數據蒐集期間，故設定以 2010 年至 2018 年間[4]我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考量金融、保險與證券業性質較為特殊，參考過去研究(Chen et al. 2018)排除這些產業之觀測值。而公司治理及其他財務變數的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為減緩極端值之潛在干擾，本研究採 Winsorized 法處理連續變數上下 1%之極端值。表 1 為本研究之選樣流程表，原始樣本共 13,469 筆觀測值，扣除金融、保險與證券業 409 筆與遺漏實證變數 1,183 筆，最終樣本共計 11,877 筆觀測值。表 2 為本研究樣本之年度及產業分布，從表 2 Panel A 可發現觀測值逐年增加，各年度觀測值占總樣本約 9.71%到 12.30%間。而根據表 2 Panel B 之內容，電子零組件業與半導體業占比最多，分別為 12.90%及 8.82%。

表 1　選樣流程表

	樣本數
2010 年至 2018 年台灣上市櫃公司觀測值	13,469
扣除：	
金融、保險與證券業	(409)
實證變數資料不齊全之觀測值	(1,183)
最終樣本觀察值	11,877

[4] 本研究樣本始於 2010 年之原因有二，第一，金管會自 2008 年開始推行「公司治理評鑑」前置作業，並要求上市櫃公司強化董事會結構、經理人資訊、持股情況等揭露。2010 年後 TEJ 與公開資訊觀測站較能系統化提供此類資料。第二， 2009 年底，金管會修訂「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強化重大訴訟與仲裁案件的揭露要求，並自 2010 年年報開始全面適用。此致訴訟相關資料可得性與一致性明顯提升。本研究將樣本期截止於 2018 年，主要考量為 2019 年以後臺灣資本市場陸續經歷部分法規之重大修正（如公司法涉及強化公司治理），因此不納入樣本期間。

臺灣人事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年度與產業分佈狀況表

Panel A: 年度分配表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樣本數	1,153	1,204	1,247	1,289	1,323
百分比	9.71	10.14	10.50	10.85	11.14
年度	2015	2016	2017	2108	合計
樣本數	1,362	1,405	1,433	1,461	11,877
百分比	11.47	11.83	12.07	12.30	100

Panel B: 產業分配表			
產業代碼	產業	樣本數	百分比
1	水泥工業	63	0.53
2	食品工業	219	1.84
3	塑膠工業	198	1.67
4	紡織纖維	416	3.50
5	電機機械	568	4.78
6	電器電纜	125	1.05
8	玻璃陶瓷	42	0.35
9	造紙工業	54	0.45
10	鋼鐵工業	379	3.19
11	橡膠工業	92	0.77
12	汽車工業	179	1.51
14	建材營造	730	6.15
15	航運	204	1.72
16	觀光	252	2.12
18	貿易百貨	104	0.88
20	其他	573	4.82
21	化學工業	286	2.41
22	生技醫療	652	5.49
23	油電燃氣	107	0.90
24	半導體業	1,048	8.82
25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797	6.71
26	光電業	814	6.85
27	通訊網路業	636	5.35
28	電子零組件業	1,532	12.90
29	電子通路業	305	2.57
30	資訊服務業	258	2.17
31	其他電子業	564	4.75
32	文化創意業	177	1.49
33	其他製造業	16	0.13
35	綠能環保	111	0.93
36	數位雲端	82	0.69
37	運動休閒	137	1.15
38	居家生活	157	1.32
合計		11,877	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 變數說明與模型建立

本研究觀察公司治理機制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應變數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之虛擬變數(LR)，本研究以當期是否將訴訟義務認列費損或負債準備判斷，有認列費損或負債準備者設為 1，即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否則為 0，代表訴訟風險管理品質較佳。自變數為公司治理(Gov)變數，分別為：(1)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為具財會背景董事之虛擬變數，若董事會有財會背景董事設為 1，否則為 0；(2)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之虛擬變數，若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設為 1，否則為 0；(3)經營團隊規模(Tops)：參考林秀鳳與李建然(2008)之衡量方式，以副總級以上之主管總人數衡量；(4)經營團隊持股比率(Share)：本研究參考林秀鳳與李建然(2008)的方式，以經理人(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衡量； (5)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以年底本國政府機構、外國機構法人、外國信託基金和外國金融機構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衡量； (6)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當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為 A+、A、B、C、C-、D、D-，分別設為 7~1。 本研究建立 Logit 迴歸模型(1)驗證研究假說：

$$LR_{it} = \alpha_0 + \alpha_1 Gov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ROA_{it} + \alpha_4 Leverage_{it} + \alpha_5 BM_{it} + \alpha_6 Board_Size_{it} + \alpha_7 IndDir_{it} + \alpha_8 Big_N_{it} + \sum Year_j + \sum Industry_k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LR_{it} ： 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之虛擬變數，若該年度有將訴訟義務認列費損或負債準備者設為 1，代表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否則為 0，代表訴訟風險管理品質較佳。

Gov_{it} ： 為公司治理變數，以下列 6 項個別衡量：
(1)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5]：為具財會背景董事之虛擬變數，若董事會有財會背景董事設為 1，否則為 0；(2)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之虛擬變數，若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設為 1，否則為 0；
(3)經營團隊規模(*Tops*)：以副總級以上之主管總人數衡量；
(4)經營團隊持股比率(*Share*)：以經理人(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衡量；

[5] 台灣經濟新報有整理董事會成員是否具財務、會計及法律三類背景的數據。根據研究主題，法律背景董事理應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具有直接影響。然而，由法律背景定義此變數皆未能發現顯著結果。作者預期此結果來自於部分公司有法律背景董事能有效監督企業訴訟風險；而部分公司可能因訴訟風險較高而納入法律背景董事，抑或法律背景董事可能根據自身判斷預期無損害或損害不大，建議公司從事更多具法律爭議性行為，導致企業訴訟風險顯著增高。建議後續學者能對此部分進行更深入地分析研究。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5)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以年底本國政府機構、外國機構法人、外國信託基金和外國金融機構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衡量；

(6)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當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為A+、A、B、C、C-、D、D-，分別設為7~1。

$Size_{it}$ ： 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

ROA_{it} ： 以稅後淨利除以資產平均數×100衡量。

$Leverage_{it}$ ： 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衡量。

BM_{it} ： 為權益淨值與市值比。

$Board_Size_{it}$ ： 為董事會規模，以董事會席次總數衡量。

$IndDir_{it}$ ： 為獨立董事占比，以獨立董事席次占董事會總席次之比重衡量。

Big_N_{it} ： 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虛擬變數，若當年度聘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則為1，否則為0。

$\sum Year_j$ ： 為年度固定效果。

$\sum Industry_k$ ： 為產業固定效果。

參考Treepongkaruna et al. (2024)與De Vincentiis (2024)等研究，本研究控制其他公司、董事會與會計師特性之變數。首先，關於公司特質的部分，我們控制企業規模(*Size*)、資產報酬率(*ROA*)、負債比(*Leverage*)及淨值市值比(*BM*)。根據政治成本假說(Watts and Zimmerman 1986)，規模越大的企業承受較多市場、媒體與主管機關之關注與監督，更可能受到放大檢視與提起訴訟，因而導致訴訟風險上升。此外，大型企業亦可能成為受害者尋求高額賠償之目標，進一步加劇其訴訟風險，故本研究預期企業規模(*Size*，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與訴訟風險管理呈現負相關。當企業績效越高時較不會從事非法事項且違約風險越低，使訴訟風險較低。此外，當公司具較高績效時，其管理階層較可能基於聲譽維護與資本市場考量，提前揭露潛在風險以減少法律後果與市場衝擊(Skinner 1994; Healy and Palepu 2001; Miller 2002)，使資訊不透明延伸之訴訟風險下降，故本研究預期資產報酬率(*ROA*，以稅後淨利除以資產平均數×100衡量)與訴訟風險管理呈現正相關。當企業負債比越高，代表公司財務風險越高，延伸訴訟風險同樣越高。而負債比較高之企業為降低債務監督成本與潛在違約風險，會傾向增加資訊透明度(Skinner 1994; Sengupta 1998)或避免從事存在訴訟風險之行為。由於預期影響並無一致推論，本研究不預期負債比(*Leverage*，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衡量)與訴訟風險管理之方向。過去研究常以淨值市值比衡量資訊不對稱程度。當淨值市值比越低，表示企業資訊不對稱程度越大。此時，企業訴訟風險可能也較大，故本研究預期淨值市值比(*BM*，為權益淨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市值比衡量)與訴訟風險管理呈現正相關。其次，我們也以董事規模(*Board_Size*，以董事會席次總數衡量)及獨立董事比率(*IndDir*，以獨立董事席次占董事會總席次之比重衡量)控制董事會特性對訴訟風險管理之潛在影響。董事會規模愈大會降低董事會監督效率(Yermack 1996; Singh and Davidson 2003)，故本研究預期董事會規模與訴訟風險管理呈負相關。而黃麗津與林穎芬(2020)表示獨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會專業度越高且越能制定最適決策，對訴訟風險有所影響，故本研究預期獨立董事比率與訴訟風險管理呈正相關。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為維護本身聲譽，查核品質較高且資訊較透明(DeAngelo 1981; Krishnan 2003; Francis 2004)，故本研究預期採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_N*，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虛擬變數，若當年度聘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則為 1，否則為 0。)與訴訟風險管理呈現正相關。最後，本研究於模型中同時加入年度固定效果與產業固定效果。首先，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可能受到不同年度的總體經濟環境、監管政策變化、資本市場氛圍或財務報導制度改革等共同時間衝擊的影響。納入年度固定效果可有效控制此類跨年度的外生變動，避免因整體環境差異而產生的估計偏誤。其次，考量本研究的應變數定義為「訴訟風險管理」，而自變數為公司治理，訴訟風險本身在產業間具系統性的差異，如 Francis et al. (1994a, 1994b) 所指出的高訴訟風險產業。因此，模型中控制產業固定效果可降低產業層級的未觀察異質性對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二者關係的干擾，避免潛在遺漏變數偏誤。

肆、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

表 3 為本研究之敘述性統計。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之虛擬變數(*LR*)平均數為 0.053，顯示有 5.3%的樣本有針對訴訟義務提列費損或負債準備，被本研究視為訴訟風險管理不佳之樣本。關於 6 項公司治理變數的部分，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平均數為 0.855，表示 85.5%的樣本董事會有財會背景董事。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平均值為 0.246，表示 24.6%的樣本存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之情況。經營團隊規模(*Tops*)的平均值為 3.836，顯示樣本經營團隊規模平均約為 4 人。經營團隊持股比例(*Share*)平均值為 1.076%，顯示樣本經營團隊持股比例並不高。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 平均數為 40.002%，顯示我國資本市場中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有相當比重。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平均值與中位數分別為 3.827 及 4.000，由於公司治理評鑑係根據排名百分位數決定評比等級，故平均數與中位數會接近 7 等級的中間值。企業規模(*Size*)平均數為 15.346，與過去研究之情況相似。資產報酬率(*ROA*)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24.042%與-32.759%，顯示樣本績效分布差異頗大。負債比(*Leverage*)平均值 0.406。淨值市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值比(*BM*)平均值為1.252。董事會規模(*Board_Size*)平均值與中位數分別為 7.162及7，兩者數值相近，故無偏態問題。獨立董事比率(*IndDir*)平均值為0.247，顯示樣本中獨立董事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_N*) 平均值為0.862，顯示有 86.2%的樣本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表 3 敘述性統計(N=11,877)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Q1	中位數	Q3	最大值
LR	0.053	0.225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BoardExp	0.855	0.352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Dual	0.246	0.43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Tops	3.836	3.509	0.000	1.000	3.000	5.000	20.000
Share	1.076	1.738	0.000	0.050	0.360	1.260	9.540
Institution	40.002	23.759	1.050	20.750	37.180	57.540	98.030
GRank^{+} [*N=4,856*]	3.827	1.897	1.000	2.000	4.000	5.000	7.000
Size	15.346	1.458	11.919	14.349	15.140	16.138	20.684
ROA	3.265	8.201	-32.759	0.431	3.738	7.527	24.042
Leverage	0.406	0.180	0.042	0.269	0.407	0.532	0.934
BM	1.252	0.798	0.061	0.664	1.115	1.675	4.095
Board_Size	7.162	1.984	4.000	5.000	7.000	8.000	15.000
IndDir	0.247	0.164	0.000	0.000	0.286	0.400	0.571
Big_N	0.862	0.344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LR* 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之虛擬變數，若該年度有將訴訟義務認列費損或負債準備者設為1，否則為0；*BoardExp* 為具財會背景董事之虛擬變數，若董事會有財會背景董事設為1，否則為0；*Dual* 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之虛擬變數，若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設為 1，否則為 0；*Tops* 為經營團隊規模，以副總級以上之主管總人數衡量；*Share* 為經營團隊持股比例，以經理人(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衡量；*Institution* 為機構投資者持股，以年底本國政府機構、外國機構法人、外國信託基金和外國金融機構持股占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衡量；*GRank* 為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當公司治理評鑑等級為 A+、A、B、C、C-、D、D-，分別設為7~1；*Size* 為企業規模，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衡量；*ROA* 為資產報酬率，以稅後淨利除以資產平均數×100 衡量；*Leverage* 為負債比，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衡量；*BM* 為權益淨值市值比；*Board_Size* 為董事會規模，以董事會席次總數衡量；*IndDir* 為獨立董事占比，以獨立董事席次占董事會總席次比重衡量；*Big_N* 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虛擬變數，若當年度聘任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則為1，否則為0。

表 4 觀察訴訟風險管理品質優劣兩組間於公司治理變數及額外測試所使用的調節變數是否存有顯著差異。實證結果發現，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組較缺乏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較少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經營團隊規模(*Tops*)及持股(*share*)皆顯著較少、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也較低，而機構投資者持股則未有顯著差異。而後續額外測試將使用的調節變數(包含家族企業虛擬變數與裁決性應計項目取絕對值)也發現兩組間存在顯著差異。整體而言，獨立樣本平均數差異 t 檢定僅以單變量測試，後續迴歸分析則將以多變量角度進行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訴訟風險管理品質優劣兩組間平均數差異 t 檢定

變數	品質欠佳組 *LR* = 1 (N=635)		品質較佳組 *LR*= 0 (N=11,242)		t 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BoardExp	0.809	0.393	0.858	0.349	-3.360***
Dual	0.209	0.407	0.248	0.432	-2.176***
Tops	3.479	3.470	3.856	3.511	-2.634***
Share	0.843	1.444	1.089	1.752	-3.471***
Institution	40.052	24.263	39.999	23.731	0. 055
	(N=227)		(N=4,629)		
GRank	3.498	2.018	3.843	1.889	-2.681***
	(N=635)		(N=11,242)		
FAM	0.707	0.455	0.628	0.483	4.010***
	(N=552)		(N=10,083)		
ADA	0.071	0.089	0.054	0.060	6.481***

註：*FAM* 為家族企業虛擬變數，若屬家族企業設為 1，否則為 0。*ADA* 為根據 Kothari et al. (2005)計算績效控制裁決性應計項目取絕對值。其他變數定義請參考表 3。 *、**、***分別表示達到雙尾 10%、5%與 1%顯著水準。

二、相關係數分析

表 5 為相關係數矩陣，左下角列示 Pearson 相關係數，而右上角則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首先，本研究所採用 6 項公司治理變數中，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與前 5 項皆具有顯著相關，一方面支持該評鑑等級屬於公司治理綜合性指標，故與其他公司治理指標皆有所關聯。另一方面也支持當有財會背景董事、董事長未兼任總經理、經營團隊規模大、經營團隊或機構投資者持股較多時普遍被視為公司治理機制較好，而有較高的公司治理評鑑等級，此關聯可做為主管機構及市場對這些指標之整體評價，例如，經營團隊持股的部分支持利益收斂假說之預期，持股越多公司治理視為較佳。

其次，針對應變數(*LR*)的部分，表 5 也發現，當存在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經營團隊規模較大或持股較多、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較高時，企業較不可能將訴訟相關義務認列為費損或負債準備。相對而言，機構投資者持股則未有顯著關聯，初步分析結果部分支持研究假說 H1。此外，相關係數矩陣中係數大多低於 0.6，表示實證模型應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相關係數矩陣(N=11,87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1.LR	**1.000**	**-0.031*****	**-0.020****	**-0.034*****	**-0.034*****	**-0.002*****	-0.033***	-0.057***	-0.064***	-0.046***	-0.006***	-0.033***	-0.042***	**-0.036****
2.BoardExp	**-0.031*****	1.000	-0.004***	-0.063***	-0.062***	-0.059***	-0.021***	-0.024***	-0.046***	-0.058***	-0.095***	-0.170***	-0.084***	-0.059***
3.Dual	**-0.020*****	-0.004***	1.000	-0.123***	-0.056***	-0.257***	-0.120***	-0.057***	-0.045***	-0.006***	-0.105***	-0.082***	-0.033***	-0.095***
4.Tops	**-0.024*****	-0.051***	-0.066***	1.000	-0.568***	-0.108***	-0.117***	-0.166***	-0.045***	-0.076***	-0.049***	-0.135***	-0.138***	-0.171***
5.Share	**-0.032*****	-0.040***	-0.042***	-0.253***	1.000	-0.195***	-0.170***	-0.137***	-0.056***	-0.019***	-0.012***	-0.147***	-0.100***	-0.087***
6.Institution	**-0.000*****	-0.055***	-0.253***	-0.034***	-0.165***	1.000	-0.423***	-0.228***	-0.078***	-0.072***	-0.226***	-0.019***	-0.123***	-0.252***
7.Size	-0.037***	-0.011***	-0.126***	-0.169***	-0.196***	-0.460***	1.000	-0.144***	-0.357***	-0.274***	-0.288***	-0.156***	-0.112***	-0.275***
8.ROA	-0.055***	-0.020***	-0.062***	-0.146***	-0.076***	-0.230***	-0.172***	1.000	-0.228***	-0.089***	-0.069***	-0.045***	-0.090***	-0.210***
9.Leverage	-0.067***	-0.047***	-0.044***	-0.085***	-0.069***	-0.079***	-0.355***	-0.212***	1.000	-0.071***	-0.019***	-0.072***	-0.019***	-0.006***
10.BM	-0.054***	-0.064***	-0.011***	-0.070***	-0.020***	-0.075***	-0.269***	-0.041***	-0.079***	1.000	-0.035***	-0.154***	-0.005***	-0.032***
11.Board_Size	-0.013***	-0.084***	-0.114***	-0.048***	-0.037***	-0.262***	-0.339***	-0.066***	-0.023***	-0.031***	1.000	-0.044***	-0.071***	-0.273***
12.IndDir	-0.030***	-0.200***	-0.059***	-0.113***	-0.109***	-0.025***	-0.129***	-0.031***	-0.066***	-0.158***	-0.036***	1.000	-0.119***	-0.064***
13.Big_N	-0.042***	-0.084***	-0.033***	-0.132***	-0.059***	-0.124***	-0.125***	-0.091***	-0.021***	-0.008***	-0.069***	-0.128***	1.000	-0.170***
14.GRank+	**-0.038*****	*-0.059****	*-0.096****	*-0.184****	*-0.049****	*-0.264****	-0.315***	-0.190***	-0.002***	-0.011***	-0.274***	-0.068***	-0.170***	1.000

註：左下角列示 Pearson 相關係數；而右上角則為 Spearman 相關係數。變數定義請參考表 3。*、**、***分別表示達到雙尾 10%、5%與 1%顯著水準。

+ 由於我國公司治理評鑑於 2014 起始開始執行，故以 GRank 衡量公司治理時樣本期間為 2014 年至 2018 年，實證樣本僅為 4,856 筆觀測值。因此，第 14 行(列)的相關係數係根據 4,856 筆觀測值計算，與前 13 行(列)不同。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迴歸分析

表 6 為本研究主實證模型之迴歸結果。前五項公司治理變數彙總於表 6 欄(1)至欄(5)。其中，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係數為-0.412，達到 5%顯著水準，表示財會背景董事能更理解財報資訊並有效提升財報之透明度與正確性，使導因於財報不實之訴訟風險降低。而財會背景董事也能幫助建構適當之內部控制，同樣能幫助企業達成法遵目標。經營團隊規模(*Tops*)係數為-0.050，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當經營團隊較大時，因多位高階主管共同參與有助於提高決策多元性與風險評估的全面性，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顯著較佳。經營團隊持股(*Share*)係數為-0.149，達到 1%顯著水準，實證結果與利益收斂假說相符，支持經營團隊擁有較多股權時有助於減緩代理成本與投機行為並更關注企業長期價值與聲譽，使企業強化其訴訟風險管理。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係數為-0.009，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機構投資者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同樣具有助益效果。根據表 3 敘述性統計，我國機構投資者持股平均約 4 成，對企業營運是重要的監督機制(Cheng et al. 2010; Pukthuanthong et al. 2017)。實證結果支持機構投資者能促進企業資訊透明與法規遵循(Bushee and Noe, 2000; Ajinkya et al. 2005)，藉此提高企業訴訟風險管理。此外，近年來 ESG 理念日漸盛行，機構投資者將更重視投資對象是否遵循 ESG 架構。而 ESG 講求善待利害關係人，有助於減緩訴訟風險，故預期機構投資者對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仍有進一步發展空間。此外，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係數分別為-0.082，未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這類權力結構並未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造成顯著影響。表 6 第(6)欄將前 5 項公司治理變數同時放入單一迴歸模型測試，除經營團隊規模(*Tops*)變成不顯著影響外，其餘實證結果與前 5 欄相似，表示同時控制其他治理機制後，經營團隊規模對訴訟風險管理並未造成顯著影響，且其餘治理機制之實證結果具相當穩健性。最後，表 6 第(7)欄以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作為公司治理綜合性指標進行測試，係數為-0.183，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公司治理評比越高時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品質較佳，支持公司治理機制確實能有效提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使企業較不可能認列訴訟相關費損或負債準備，支持研究假說 H1。

在控制變數方面，負債比(*Leverage*)係數大多顯著為正，支持高負債比企業財務風險通常較高，延伸訴訟風險管理較差；淨值市值比(*BM*)係數皆顯著為正，支持資訊不對稱較嚴重之企業訴訟風險較佳，與本研究預期相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_N*)係數則大多顯著為負，支持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財報品質較佳且有助於提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預期。此外，過去公司治理文獻常用到的董事會變數，包含董事會規模(*Board_Size*)及獨立董事比率(*IndDir*)於大多數的模型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此二者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較為有限。

本文曾從內部控制、代理理論、資訊不對稱、利害關係人理論及聲譽理論去推論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間的關聯，本節進一步嘗試將不同公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司治理機制之實證結果，與先前所提及的理論預期加以連結。誠然，這些治理機制與理論間的劃分難以清楚劃分，但從本文實證結果或能提供若干可供對照的脈絡。首先，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之顯著效果，顯示其能透過強化財務報導揭露品質及內部控制，進而提升企業之訴訟風險管理，這一發現與內部控制及資訊不對稱理論的觀點相互呼應。相對而言，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及控制變數中的負債比(*Leverage*)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_N*)則提供利害關係人理論與聲譽理論之證據，因為外部投資人與債權人等壓力可能促使企業更審慎處理潛在爭議，降低訴訟發生或後續敗訴之可能性。

至於董事長兼任總經理(*Dual*)與經營團隊持股(*Share*)皆涉及經理人與股東間的代理問題。然而，本研究並未發現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對訴訟風險管理具顯著影響，顯示不同企業特質可能導致效果不一，相關細節於額外測試中進一步探討。最後，經營團隊規模(*Tops*)之顯著效果可能來自於資源基礎觀點與多元決策效益，與先前推論並無直接關連。而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則屬一綜合性指標，難以明確歸類於特定推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6　公司治理對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主要實證模型

	(1)	(2)	(3)	(4)	(5)	(6)	(7)
	LR	*LR*	*LR*	*LR*	*LR*	*LR*	*LR*
BoardExp	-0.412**					-0.392**	
	(-2.130)					(-2.020)	
Dual		-0.082				-0.139	
		(-0.420)				(-0.700)	
Tops			-0.050*			-0.037	
			(-1.820)			(-1.300)	
Share				-0.149***		-0.144**	
				(-2.660)		(-2.510)	
Institution					-0.009*	-0.011**	
					(-1.900)	(-2.190)	
GRank							-0.183*
							(-1.810)
Size	-0.094	-0.093	-0.119	-0.074	-0.158*	-0.166*	-0.087
	(1.060)	(1.050)	(1.330)	(0.830)	(1.660)	(1.700)	(0.540)
ROA	-0.016*	-0.016*	-0.015*	-0.014	-0.014	-0.012	-0.010
	(-1.830)	(-1.790)	(-1.670)	(-1.620)	(-1.540)	(-1.330)	(-0.480)
Leverage	-1.062**	-1.097**	-1.118**	-1.093**	-1.005*	-0.987*	-0.300
	(1.970)	(2.030)	(2.070)	(2.020)	(1.850)	(1.810)	(0.270)
BM	-0.240**	-0.237***	-0.235**	-0.247**	-0.183*	-0.193*	-0.461**
	(2.320)	(2.290)	(2.280)	(2.380)	(1.730)	(1.810)	(2.050)
Board_Size	-0.028	-0.036	-0.035	-0.035	-0.023	-0.020	-0.158*
	(-0.570)	(-0.720)	(-0.720)	(-0.710)	(-0.470)	(-0.401)	(1.670)
IndDir	-0.116	-0.013	-0.062	-0.086	-0.010	-0.318	-1.628
	(0.210)	(-0.020)	(0.120)	(0.160)	(0.020)	(0.580)	(1.160)
Big_N	-0.480*	-0.508*	-0.481*	-0.491*	-0.472*	-0.414	-0.891*
	(-1.810)	(-1.920)	(-1.810)	(-1.850)	(-1.780)	(-1.550)	(-1.790)
Intercept	-1.552	-1.739	-2.141	-1.431	-2.382	-2.030	-3.428
	(-0.890)	(-1.000)	(-1.230)	(-0.820)	(-1.350)	(-1.120)	(-1.020)
Observations	11,877	11,877	11,877	11,877	11,877	11,877	4,856
Industry FE &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ald_chi2	94.11	90.80	92.62	94.95	92.01	101.2	59.05
Prob_gt_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59

註：變數定義請參考表 3。*、**、***分別表示達到雙尾 10%、5%與 1%顯著水準。

四、 額外測試

(一) 家族企業之調節效果

在我國資本市場中，家族企業佔據重要比重(Yeh et al. 2001)。家族企業藉由金字塔結構或交叉持股掌握控制權，並委派家族成員擔任董事、監察人或高階主管等重要職位，形成高度集中的控制結構(Claessens et al. 2000)。根據代理理論(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當控制權與所有權過度集中於特定家族內部時，將產生控制股東與小股東間的代理問題。若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與內部制衡機制，控制家族可能基於自利誘因，從事諸如盈餘操縱、隱匿或遞延不利消息(Fan and Wong 2002)、甚至掏空資產或侵害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行為，造成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顯著較差。表 4 的實證結果也可發現，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組較多來自於家族企業。此外，家族企業具備獨特的治理機制(Villalonga et al. 2015; Ramadani et al. 2024)，故先前實證結果可能會受到家族企業之干擾。

因此，本節根據是否屬於家族企業(*FAM*)進行分組測試，實證結果彙總於表 7。表 7 前 2 欄的實證結果可發現，當以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414 及-0.411，僅後者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主測試發現具財會背景董事有助於提升訴訟風險管理，僅存在於家族型企業。此結果可能反映，家族型企業具更集中且穩定的控制結構下，當董事會引入具財會背景董事後能更有效授權並採納其專業建議，有助於強化訴訟風險管理流程。相較之下，若僅由家族成員組成則專業監督功能可能受限。表 7 欄(5)及欄(6)的實證結果可發現，當以經營團隊規模(*Tops*)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094 及-0.028，僅前者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主測試發現經營團隊規模將提升訴訟風險管理之現象僅存在於非家族企業。由於家族企業常委派家族成員擔任高階主管，而非考量其專業程度，故導致經營團隊規模之效益不復存在。表 7 欄(7)及欄(8)的實證結果可發現，當以經營團隊持股(*Share*)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161 及-0.120，皆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無論家族企業與否，經營團隊持股皆能有效提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類似前段推論，由於家族企業之經營團隊可能出自家族成員，較多持股將產生誘因促使經營團隊更關注長期價值與公司聲譽，使其更有動機落實法律遵循與資訊透明化，使企業訴訟風險管理提升，與利益收斂假說預期相符。表 7 欄(9)及欄(10)的實證結果可發現，當以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031 及 0.001，僅前者達到 1%顯著水準，表示主測試發現機構投資者有助於提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現象僅存在於非家族企業，表示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的監督效果仍難以適用於控制權集中的家族企業。除上述變數外，無論是否屬於家族企業，其餘公司治理變數皆未對訴訟風險管理造成顯著影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7　家族企業之分組測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Gov = BoardExp		*Gov = Dual*		*Gov = Tops*		*Gov = Share*		*Gov = Institution*		*Gov = GRank*	
	FAM=0	FAM=1	FAM=0	FAM=1	FAM=0	FAM=1	FAM=0	FAM=1	FAM=0	FAM=1	FAM=0	FAM=1
Gov	-0.414***	-0.411***	-0.508***	-0.123***	-0.094***	-0.028***	-0.161***	-0.120***	-0.031***	-0.001***	-0.148***	-0.199***
	(-1.070)	(-1.780)	(-1.390)	(0.530)	(-2.050)	(-0.780)	(-1.750)	(-1.650)	(-3.240)	(0.210)	(-0.810)	(-1.480)
Size	-0.122***	-0.112***	-0.102***	-0.116***	-0.170***	-0.126***	-0.082***	-0.099***	-0.375***	-0.104***	-0.082***	-0.054***
	(0.800)	(1.000)	(0.680)	(1.030)	(1.110)	(1.120)	(0.530)	(0.860)	(2.090)	(0.880)	(0.280)	(-0.230)
ROA	-0.029***	-0.011***	-0.028***	-0.010***	-0.025***	-0.010***	-0.024***	-0.010***	-0.020***	-0.010***	-0.043***	-0.008***
	(-1.800)	(-1.000)	(-1.740)	(-0.950)	(-1.570)	(-0.930)	(-1.510)	(-0.890)	(-1.230)	(-0.940)	(-1.170)	(0.280)
Leverage	-2.162***	-0.847***	-2.225***	-0.850***	-2.378***	-0.858***	-2.255***	-0.858***	-2.148***	-0.854***	-0.194***	-0.532***
	(2.130)	(1.300)	(2.200)	(1.310)	(2.330)	(1.320)	(2.220)	(1.300)	(2.050)	(1.310)	(-0.090)	(0.370)
BM	-0.376***	-0.173***	-0.379***	-0.168***	-0.373***	-0.169***	-0.387***	-0.183***	-0.205***	-0.151***	-0.399***	-0.710***
	(2.080)	(1.350)	(2.100)	(1.310)	(2.060)	(1.320)	(2.130)	(1.420)	(1.070)	(1.150)	(0.910)	(2.390)
Board_Size	-0.012***	-0.057***	-0.002***	-0.063***	-0.004***	-0.065***	-0.008***	-0.067***	-0.007***	-0.054***	-0.342***	-0.093***
	(0.140)	(-0.940)	(-0.030)	(-1.030)	(0.040)	(-1.070)	(0.090)	(-1.090)	(0.080)	(-0.890)	(1.830)	(0.690)
IndDir	-0.328***	-0.065***	-0.121***	-0.204***	-0.281***	-0.135***	-0.431***	-0.164***	-0.387***	-0.243***	-5.296***	-0.679***
	(0.330)	(-0.100)	(0.120)	(-0.310)	(0.290)	(-0.210)	(0.440)	(-0.250)	(0.390)	(-0.370)	(1.840)	(-0.400)
Big_N	-1.402***	-0.312***	-1.444***	-0.338***	-1.406***	-0.324***	-1.318***	-0.350***	-1.411***	-0.347***	-0.510***	-1.020***
	(-2.570)	(-1.000)	(-2.680)	(-1.080)	(-2.580)	(-1.040)	(-2.420)	(-1.100)	(-2.530)	(-1.110)	(-0.460)	(-1.650)
Intercept	-3.953***	-1.572***	-3.727***	-1.916***	-4.929***	-1.997***	-3.625***	-1.532***	-6.620***	-1.775***	-9.241***	-0.039***
	(-1.420)	(-0.770)	(-1.350)	(-0.930)	(-1.740)	(-0.970)	(-1.300)	(-0.730)	(-2.170)	(-0.850)	(-2.270)	(-0.010)
Observations	4,365	7,512	4,365	7,512	4,365	7,512	4,365	7,512	4,365	7,512	1,838	3,018
Wald_chi2	49.72	59.57	52.00	57.22	51.09	57.49	51.12	56.85	50.29	56.26	21.83	42.00
Prob_gt_chi2	0.0790	0.0864	0.0519	0.124	0.0615	0.119	0.0612	0.131	0.0713	0.143	0.746	0.194

註：*FAM*為家族企業虛擬變數，若屬家族企業設為 1，否則為 0。其他變數定義請參考表 3。*、**、***分別表示達到雙尾 10%、5%與 1%顯著水準。

臺灣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二) 盈餘品質之調節效果

盈餘品質(earnings quality)被廣泛視為企業資訊透明度與誠信經營之重要指標，對於投資者判斷企業真實財務狀況具關鍵影響。裁決性應計數(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常被用於衡量盈餘管理程度，反映管理者對財報數字之裁量空間，亦可捕捉企業傳遞真實營運數據給外部利害關係人之意願(Dechow et al. 1995; Francis et al. 2005)。本節測試盈餘品質對先前實證結果之調節效果。首先，較低的盈餘品質通常與盈餘操縱、虛增收益、或不當會計估計有關，這些因素皆可能導致投資人、債權人及主管機關對企業提起訴訟(Hennes et al. 2008)。表 4 的實證結果也可發現，低訴訟風險管理組的盈餘品質顯著較低，故盈餘品質與訴訟風險管理有所影響。因此，藉由實證結果可觀察訴訟環境不同時公司治理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關係是否有所不同。其次，盈餘品質亦可能調節公司治理與訴訟風險管理之關係。企業在治理機制較為健全的情況下，若盈餘品質仍低落，可能顯示治理機制流於形式，未能有效制衡管理階層，進而未能有效管理企業訴訟風險；反之，若企業具有良好財報品質而較具資訊透明與誠信聲譽(Hope 2003; Francis and Wang 2008)，即使治理結構較弱也可能有效降低外部訴訟及後續敗訴之可能性，故實證結果可分析公司治理機制與盈餘品質交互影響下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

因此，本節根據 Kothari et al. (2005)提出績效控制模型計算裁決性應計數後取絕對值，並根據當年度產業別中位數區分為盈餘品質高低兩組進行測試(低於中位數為高盈餘品質組，*EQ* 設為 1；高於中位數為低盈餘品質組，*EQ* 設為 0)，實證結果彙總於表 8。表 8 前 2 欄的實證結果發現，當以具財會背景董事(*BoardExp*)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695 及-0.243，僅前者達到 5%顯著水準，表示主測試發現財會背景董事有助於提升訴訟風險管理，僅存在於高盈餘品質的企業。表 8 欄(5)及欄(6)的實證結果發現，當以經營團隊規模(*Tops*)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099 及-0.018，僅前者達到 5%顯著水準。表 8 欄(7)及欄(8)的實證結果發現，當以經營團隊持股(*Share*)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156 及-0.024，僅前者達到 10%顯著水準，同樣表示主測試結果顯示經營團隊規模或持股將提升訴訟風險管理之現象僅存在於高盈餘品質的企業。表 8 欄(9)及欄(10)的實證結果發現，當以機構投資者持股(*Institution*)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001 及-0.012，僅後者達到 10%顯著水準，表示主測試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有助於提升訴訟風險管理之現象僅存在於盈餘品質低的企業。表 8 欄(11)及欄(12)的實證結果發現，當以公司治理評鑑等級(*GRank*)作為治理(*Gov*)變數時，係數分別為-0.177 及-0.291，僅後者達到 5%顯著水準，同樣發現主測試結果顯示公司治理評鑑等級有助於增加訴訟風險管理之現象僅存在於盈餘品質低的企業。整體而言，對於盈餘品質較佳的企業而言，部分內部治理機制(如具財會背景董事、經營團隊規模或持股)有助於強化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但對於盈餘品質較差之企業來說，內部治理機制可能流於形式，無法具體發揮效果；相對而言，外部治理機制的機構投資者與公司治理評鑑評比則較具顯著影響，反映機構投資者對此類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具有效之監督效能。除上述變數外，其餘公司治理變數皆未對訴訟風險管理造成顯著影響，與主測試結果相似。

臺灣大學會計研究資訊網

表 8　盈餘品質之分組測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Gov = BoardExp		*Gov = Dual*		*Gov = Tops*		*Gov = Share*		*Gov = Institution*		*Gov = GRank*	
	EQ=1	*EQ*=0	*EQ*=1	*EQ*=0	*EQ*=1	*EQ*=0	*EQ*=1	*EQ*=0	*EQ*=1	*EQ*=0	*EQ*=1	*EQ*=0
Gov	-0.695***	-0.243***	-0.452***	-0.160***	-0.099***	-0.018***	-0.156***	-0.024***	-0.001***	-0.012***	-0.177***	-0.291***
	(-2.150)	(-0.810)	(-1.380)	(-0.570)	(-2.210)	(-0.460)	(-1.660)	(-0.320)	(-0.090)	(-1.760)	(-1.240)	(-2.100)
Size	-0.189***	-0.072***	-0.173***	-0.073***	-0.228***	-0.082***	-0.162***	-0.069***	-0.193***	-0.159***	-0.075***	-0.157***
	(1.430)	(0.610)	(1.280)	(0.610)	(1.700)	(0.690)	(1.180)	(0.580)	(1.280)	(1.230)	(0.360)	(0.720)
ROA	-0.003***	-0.018***	-0.002***	-0.018***	-0.001***	-0.017***	-0.000***	-0.017***	-0.001***	-0.016***	-0.015***	-0.018***
	(-0.180)	(-1.480)	(-0.130)	(-1.480)	(0.060)	(-1.430)	(0.010)	(-1.440)	(-0.070)	(-1.310)	(-0.390)	(-0.670)
Leverage	-1.536***	-1.685***	-1.597***	-1.716***	-1.706***	-1.715***	-1.643***	-1.718***	-1.581***	-1.573***	-1.808***	-0.437***
	(1.720)	(2.210)	(1.760)	(2.250)	(1.920)	(2.250)	(1.800)	(2.240)	(1.720)	(2.040)	(1.140)	(0.300)
BM	-0.178***	-0.253***	-0.175***	-0.257***	-0.182***	-0.256***	-0.188**	-0.259***	-0.133***	-0.202***	-0.575***	-0.452***
	(1.100)	(1.610)	(1.070)	(1.630)	(1.120)	(1.630)	(1.140)	(1.640)	(0.780)	(1.260)	(1.940)	(1.440)
Board_Size	-0.090***	-0.047***	-0.105***	-0.056***	-0.100***	-0.052***	-0.102***	-0.051***	-0.088***	-0.047***	-0.102***	-0.136***
	(-1.190)	(-0.660)	(-1.370)	(-0.780)	(-1.320)	(-0.730)	(-1.300)	(-0.720)	(-1.130)	(-0.650)	(0.830)	(1.020)
IndDir	-0.630***	-0.213***	-0.401***	-0.275***	-0.507***	-0.257***	-0.494***	-0.269***	-0.318***	-0.175***	-0.465***	-2.144***
	(0.720)	(-0.270)	(0.460)	(-0.350)	(0.590)	(-0.320)	(0.560)	(-0.340)	(0.360)	(-0.220)	(0.250)	(1.000)
Big_N	-0.496***	-0.711***	-0.547***	-0.730***	-0.492***	-0.712***	-0.523***	-0.719**	-0.544***	-0.675***	-0.388***	-0.728***
	(-1.180)	(-2.050)	(-1.280)	(-2.110)	(-1.170)	(-2.050)	(-1.210)	(-2.070)	(-1.260)	(-1.940)	(-0.570)	(-1.100)
Intercept	-3.323***	-0.847***	-3.286***	-0.622***	-4.343***	-0.950***	-3.306***	-0.774***	-3.797***	-1.654***	-2.703***	-10.926***
	(-1.450)	(-0.220)	(-1.390)	(-0.160)	(-1.870)	(-0.250)	(-1.390)	(-0.200)	(-1.550)	(-0.430)	(-0.770)	(-2.990)
Observations	5,163	5,472	5,163	5,472	5,163	5,472	5,163	5,472	5,163	5,472	2,301	2,531
Wald_chi2	59.43	48.24	55.03	48.17	59.67	47.98	51.53	47.84	49.44	49.18	35.90	34.33
Prob_gt_chi2	0.060	0.174	0.123	0.176	0.058	0.181	0.203	0.184	0.265	0.152	0.426	0.548

註：分組變數為盈餘品質(*EQ*)，係根據 Kothari et al. (2005)計算績效控制裁決性應計數取絕對值，並根據該年度產業別之中位數區分為盈餘品質高低兩組。低於中位數為高盈餘品質組，*EQ* 設為 1；高於中位數為低盈餘品質組，*EQ* 設為 0。其他變數定義請參考表 3。*、**、***分別表示達到雙尾 10%、5%與 1%顯著水準。

臺灣人壽保險 期刊資料庫

（三）將揭露或有負債者納入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組

本研究主要實證模型將僅揭露訴訟相關或有負債者視為訴訟風險管理品質較佳組。然而，揭露或有負債者有二情況：發生之可能性達到很有可能但金額無法可靠估計，及發生的可能性未達很有可能發生。後者可能導因於良好的訴訟風險管理而有效減少後續敗訴賠償之可能性，但前者較難與訴訟風險管理良莠建立關係，使得實證變數衡量存在衡量誤差。此外，過往文獻已指出，公司在面臨訴訟時，往往傾向僅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而避免將訴訟義務認列為負債準備。Nilsen (2011) 認為，若公司認列訴訟損失，該金額可能成為和解談判中的最低門檻，甚至在法院審理中被作為不利於公司的證據，因此管理者有動機避免過早認列。Verrecchia (1983) 進一步從理論面闡述「私有資訊成本」(proprietary cost) 的角色，指出當揭露資訊可能使公司處於不利地位時，管理者傾向減少揭露，或僅提供模糊化的資訊。類似地，Kothari et al. (2009) 提出「壞消息遞延」(bad news hoarding) 的觀點，認為管理者傾向延後揭露或認列不利消息，特別是損失的認列會直接降低盈餘，進而影響管理者的績效評估與薪酬。綜合上述文獻，公司在訴訟情境下通常更傾向僅揭露而非認列負債準備，因此「僅揭露而非認列負債準備」可能包含那些我們沒辦法透過手動蒐集資料辨認出的訴訟風險管理品質欠佳之案例，故廣義來說亦可被視為一項反映公司在訴訟過程中風險管理不良的一部分。受限於實證數據難以釐清上述疑慮，故本節將原本 *LR* 的定義更改為 *LR1* 定義為公司該年度若有針對訴訟義務認列費損、負債準備或揭露或有負債者為 1，其餘為 0。實證結果如表 9，與先前實證結果並無顯著差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9　將揭露或有負債者視為低訴訟風險管理之額外測試

	(1)	(2)	(3)	(4)	(5)	(6)	(7)
VARIABLES	*LR1*	*LR1*	*LR1*	*LR1*	*LR1*	*LR1*	*LR1*
BoardExp	-0.291***					-0.281***	
	(-2.060)					(-1.990)	
Dual		-0.110***				-0.102***	
		(0.810)				(0.740)	
Tops			-0.044***			-0.051***	
			(-2.070)			(-2.340)	
Share				-0.039***		-0.054***	
				(0.990)		(1.340)	
Institution					-0.007***	-0.007***	
					(-2.000)	(-1.880)	
GRank							-0.170***
							(-1.980)
Size	-0.508***	-0.511***	-0.532***	-0.514***	-0.555***	-0.584***	-0.689***
	(6.610)	(6.650)	(6.850)	(6.680)	(6.890)	(7.130)	(3.850)
ROA	-0.034***	-0.034***	-0.033***	-0.034***	-0.033***	-0.032***	-0.012***
	(-5.140)	(-5.050)	(-5.000)	(-5.130)	(-4.850)	(-4.810)	(-0.660)
Leverage	-0.667***	-0.668***	-0.654***	-0.668***	-0.632***	-0.656***	-2.673***
	(1.610)	(1.610)	(1.580)	(1.610)	(1.530)	(1.580)	(2.570)
BM	-0.141***	-0.139***	-0.142***	-0.140***	-0.115***	-0.117***	-0.409***
	(1.690)	(1.660)	(1.700)	(1.670)	(1.360)	(1.380)	(1.890)
Board_Size	-0.041***	-0.045***	-0.048***	-0.046***	-0.041***	-0.037***	-0.044***
	(-1.070)	(-1.160)	(-1.250)	(-1.190)	(-1.050)	(-0.950)	(0.530)
IndDir	-0.053***	-0.018***	-0.038***	-0.039***	-0.022***	-0.114***	-0.789***
	(0.140)	(-0.050)	(0.100)	(-0.100)	(0.060)	(0.290)	(-0.750)
Big_N	-0.536***	-0.560***	-0.536***	-0.567***	-0.525***	-0.507***	-0.809***
	(-2.450)	(-2.560)	(-2.450)	(-2.590)	(-2.400)	(-2.300)	(-1.410)
Intercept	-5.509***	-5.773***	-5.985***	-5.787***	-6.091***	-6.384***	-7.179***
	(-2.920)	(-3.050)	(-3.150)	(-3.060)	(-3.210)	(-3.330)	(-1.910)
Observations	11,877	11,877	11,877	11,877	11,877	11,877	4,856
Industry FE &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ald_chi2	185.3	182.1	185.2	182.1	184.7	193.8	115
Prob_gt_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註：*LR1* 為低訴訟風險管理之虛擬變數，若該年度有將訴訟義務認列費損、負債準備及揭露或有負債者設為 1，否則為 0。其他變數定義請參考表 3。*、**、***分別表示達到雙尾 10%、5%與 1%顯著水準。

伍、研究結論

本研究探討臺灣上市櫃企業公司治理機制與訴訟風險管理間的關聯，實證結果顯示，具財會背景董事、經營團隊規模與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呈顯著正相關，表示這類公司治理機制能對訴訟風險管理產生監督效應，本研究也採用公司治理評鑑等級作為公司治理之綜合指標，實證結果也發現當公司治理等級越優秀時企業訴訟風險管理越優異，較不會將訴訟義務認列為費損或負債準備，支持公司治理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間存在顯著影響。此外，本研究也進一步探討家族企業與盈餘品質是否對先前結論產生干擾。相關實證結果發現，大多數先前實證結果僅存在於特定組別，例如，對家族企業組而言，僅具財會專家董事與經營團隊持股這類內部治理機制才能產生增強訴訟風險管理；而對低盈餘品質組，僅機構投資者能有所影響，表示不同情境下公司治理機制對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之影響可能有所不同。整體而言，本研究填補過去文獻對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訴訟風險管理關聯之缺口，並提供主管機關者與實務界在提升我國企業訴訟風險管理上之重要參考。

本研究以當期是否將訴訟義務認列為費損或負債準備作為低訴訟風險管理之代理變數，受限於我國公司可取得之訴訟資料有限，研究者並無法系統性追蹤個別訴訟案件始末及蒐集企業逐年對案件之內部評估。後續研究者可嘗試藉由其他管道(如司法判決書)或問卷訪談等方式蒐集資料，以減少變數衡量誤差。此外，訴訟案件的類型與成因各有不同，例如，專利權或反托拉斯法等更可能導因於市場競爭，而非受控訴方刻意從事違法行為。此時，較多法律爭議表示該企業受競爭對手之忌憚，公司治理或許無法有效減少此類訴訟風險。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將訴訟案件類型進行分類，以便對此議題能有更深入地剖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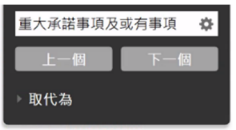
附錄

研究資料蒐集範例:

由於台灣並沒有像美國有完整的訴訟案資料庫(例:Audit Analytics、SCAC 等)，故本研究僅能透過閱讀公司年報一筆一筆蒐集，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以公司層級之年報為主要來源。以帝寶公司（公司代碼 6605）為例，研究者首先自公開資訊觀測站下載公司所有年度年報，並針對「或有事項」、「期後事項」與「附註揭露」三個部分進行搜尋，因為台灣公司通常會在這些段落揭露訴訟相關資訊。依據揭露內容，研究者建立 Excel 檔案進行紀錄。具體而言，若有訴訟案件，則先為其建立案件代碼（例如，美國與加拿大的兩起集體訴訟案分別編為 10001 與 10002）；若公司揭露案件的起訖日期，則進一步填入相關變數；同時辨識訴訟資訊是出現在「或有事項」、「期後事項」或「附註揭露」；再者，判斷公司在案件中是原告或被告，並於後續分析中僅保留被告案件。對於是否認列或僅揭露，也逐一加以區分；若有認列，則進一步蒐集認列金額。研究者於樣本期間逐年追蹤，若有新案件發生，則新增案件代碼。蒐集層級為「公司－年度－案件」，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則彙整為「公司－年度」的一筆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二、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除其他附註所述者外，本公司及子公司尚有下列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一) 截至一〇〇年底止，本公司及子公司為購置各項設備、模具及營造工程合約已簽訂合約而尚未付款金額約為 1,556,387 仟元。

(二) 截至一〇〇年底止，本公司為購買原料已開立尚未使用之信用狀餘額約為 31,387 仟元。

(三) 本公司間接持有 100%之股權帝寶昆山公司、江蘇晨揚公司及 Maxzone 公司分別與銀行簽訂融資額度美金 15,000 仟元、美金 9,000 仟元及美金 10,000 仟元之合約，本公司承諾監督其營運，以履行債務合約。

(四) 美國 Sabry Lee, Inc 及 DJ's Autobody, Inc.與若干公司等分別於九十七年起，陸續向美國加州地區聯邦法院對本公司及關係企業與其他汽車零件售後市場之車燈供應商提出違反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s）之民事訴訟及集體訴訟，另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收到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通知函，就本公司及關係企業與其他廠商產品銷售行為展開違反反托拉斯法調查。上開案件刑事部分已由實際銷售行為人 Maxzone 公司以美金 43,000 仟元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並由本公司提供背書保證，而 Maxzone 公司於西元二〇一一年十二月起得以五年六期分期支付該筆款項；民事部分之集體訴訟 Maxzone 公司亦以美金 25,000 仟元與原告達成初步和解共識，於西元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提付，原告同意撤回該訴訟案並拋棄相關權利，雙方律師並已依法向法院聲請初步許可確認該和解。另美國 Sabry Lee, Inc 對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所提之民事訴訟案已達成和解，該公司並於美國當地時間西元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撤銷告訴，同時放棄未來所有針對此案件之請求權利。本公司及關係企業已就上述刑事、民事訴訟案及集體訴訟之和解金分別估列入帳。

圖 1　研究資料蒐集範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李馨蘋與莊宗憲，2007，公司治理機制與公司績效之實證研究，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57 期：1-27。(Lee, Shin-Ping, and Tsung-Hsien Chuang. 2007. An empirical study betwee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firm performance. *Soochow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7: 1-27.)

林秀鳳與李建然，2008，管理特質對企業績效之影響，中山管理評論，第 16 卷，第 4 期：703-742。(Lin, Hsiu-Feng, and Jan-Zan Lee. 2008. The impact of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16 (4): 703-742.)

林穎芬、馮軒綾與洪鈺浩，2018，機構投資人、董事會結構、薪酬與關係人交易，中華會計學刊，第 14 卷，第 1 期：1-29。 (Lin, Ying Fen, Hsuan-Ling Feng, and Yu-Hao Hong. 2018.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oard structure, compensation an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14 (1): 1-2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2015，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2015 年正體中文版，網址：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AS37_2019.pdf?1584720。 (Accoun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2015.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37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2015 Traditional Chinese Vers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163.29.17.154/ifrs/ifrs_2019_approved/IAS37_2019.pdf?1584720.)

黃麗津與林穎芬，2020，總經理減薪效應、公司治理與家族企業，臺大管理論叢，第 30 卷，第 1 期：65-102。(Huang, Li-Jin, and Ying-Fen Lin. 2020. CEO pay cut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amily business. *NTU Management Review* 30 (1): 65-102.)

廖益興與楊清溪，2007，公司治理機制與財務報表品質之關聯性研究，財務金融學刊，第 15 卷，第 3 期：67-112。 (Liao, Yi-Hsing, and Ching-Hsi Yang. 2007.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quality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15 (3): 67-112.)

劉福運、吳宗翰與林岳喬，2018，公司治理與盈餘品質：公司治理評鑑級距的影響，台灣管理學刊，第 18 卷，第 2 期：29-47。(Liu, Fu Yun, Tsung-Han Wu, and Yuah-Chiao Lin. 2018.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quality: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anking mechanisms. *Taiw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8 (2): 29-47.)

薛敏正、邱彥毅與邱詩婷，2017，公司治理評鑑與盈餘品質，會計審計論叢，第 7 卷，第 2 期：57-83。(Shiue, Min Jeng, Yan-Yi Chiou, and Shih-Ting Chiu. 2017. Corporate governance ranking mechanisms and earnings quality.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tudies* 7 (2): 57-83.)

Abernathy, J. L., B. Beyer, A. Masli, and C. Stefaniak. 201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audit committee accounting experts, audit committee chair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timeliness. *Advances in Accounting* 30 (2): 283-297.

Ajinkya, B., S. Bhojraj, and P. Sengupta. 2005.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utside directo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properties of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3 (3): 343-376.

Ang, J. S., R. A. Cole, and J. W. Lin. 2000.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5 (1): 81-106.

Armstrong, C. S., W. R. Guay, and J. P. Weber. 2010.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por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ebt contrac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0 (2-3): 179-234.

Ashbaugh-Skaife, H., D. W. Collins, and R. LaFond. 2006.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firms' credit rat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2 (1-2): 203-243.

Badawi, A. B., and F. Partnoy. 2022. Social good and litigation risk. *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 12: 315-370.

Beasley, M. S. 199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The Accounting Review* 71 (4): 443-465.

Billings, M. B., M. C. Cedergren, and S. Dube. 2021. Does litigation change managers' beliefs about the value of voluntarily disclosing bad new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6 (4): 1456–1491.

Bushee, B. J., and C. F. Noe. 2000. Corporate disclosure practice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stock return volati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8 (Supplement): 171-202.

Bushman, R. M., and A. J. Smith. 2001.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2 (1-3): 237-333.

Bu, J., T. Fei, and F. Zhou. 2024.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stability on corporate litig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96: 103676.

Cen, L., F. Chen, Y. Hou, and G. D. Richardson. 2018. Strategic disclosures of litigation loss contingencies when custom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are at risk. *The Accounting Review* 93 (2): 137-159.

Chen, F., Y. Hou, G. Richardson, and M. Ye. 2018. Auditor experience and the timeliness of litigation loss contingency disclosure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5 (2): 956-979.

Chen, G., M. Firth, D. N. Gao, and O. M. Rui. 2006. Ownership struc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raud: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2 (3): 424-448.

Cheng, C. A., H. H. Huang, Y. Li, and G. Lobo. 2010. 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through shareholder litig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5 (3): 356-383.

Chemmanur, T. J., and I. Paeglis. 2005. Management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6 (2): 331-368.

Choi, B. B., D. Lee, and Y. Park. 2013.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Kore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1 (5): 447-467.

Claessens, S., S. Djankov, and L. H. P. Lang. 2000.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East Asian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1-2): 81-112.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2013. *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 New York, NY: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re, J. E., R. W. Holthausen, and D. F. Larcker. 1999. Corporate governanc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1 (3): 371-406.

De Vincentiis, P. 2024. ESG news, stock volatility and tactical disclosur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68: 102187.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 (3): 183-1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chow, P. M., R. G. Sloan, and A. P. Sweeney.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70 (2): 193–225.

Dechow, P. M., R. G. Sloan, and A. P. Sweeney. 1996.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arnings manipulation: An analysis of firm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actions by the SEC.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3 (1): 1-36.

Desir, R., K. Fanning, and R. J. Pfeiffer. 2010. Are revisions to SFAS No. 5 needed?. *Accounting Horizons* 24 (4): 525–545.

Eccles, R. G., I. Ioannou, and G. Serafeim. 2014.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cience* 60 (11): 2835-2857.

Fan, J. P. H., and T. J. Wong. 2002.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3 (3): 401-425.

Finkelstein, S., and R. A. D'Aveni. 1994. CEO duality as a double-edged sword: How boards of directors balance entrenchment avoidance and unity of comma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7 (5): 1079-1108.

Fombrun, C. A. 1996. *Reputation: Realizing Value from the Corporate Image*.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Francis, J., D. Philbrick, and K. Schipper. 1994a. 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2 (2): 137-164.

Francis, J., D. Philbrick, and K. Schipper. 1994b. Determinants and Outcomes in Class Action Securities Litigation.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Francis, J. R. 2004. What do we know about audit quality?.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36 (4): 345-368.

Francis, J. R., and D. Wang. 2008. The joint effect of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Big 4 audits on earnings 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5 (1): 157-191.

Francis, J., R. LaFond, P. M. Olsson, and K. Schipper. 2005. The market pricing of accruals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9 (2): 295-327.

Freeman, R. E.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MA: Pitman.

Frost, C. A. 1991. Loss contingency reports and stock pric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Banks and Kinne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9 (1): 157-169.

Gleason, C. A., and L. F. Mills. 2002. Materiality and contingent tax liability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77 (2): 317-342.

Haleblian, J., and S. Finkelstein. 1993. Top management team size, CEO domi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and discre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4): 844-863.

Hambrick, D. C. 1995. Fragmentation and the other problems CEOs have with their top management team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7 (3): 110-127.

Healy, P. M., and K. G. Palepu. 2001.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1 (1-3): 405–440.

Hennes, K. M. 2014. Disclosure of contingent legal liabilit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33 (1): 32-50.

Hennes, K. M., A. J. Leone, and B. P. Miller. 2008.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errors from irregularities in restatement research: The case of restatements and CEO/CFO turnover.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6): 1487-1519.

Hope, O. K. 2003. Disclosure practices, enforce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analysts' forecast accuracy: An 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1 (2): 235-272.

臺灣博碩士論文期刊資料庫

Houston, J. F., C. Lin, S. Liu, and L. Wei. 2019. Litigation risk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legal chang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94 (5): 247-272.

Huang, H. Y., E. Lohwasser, Z. Yu, and H. Chang. 2024. Opportunistic avoidance of litigation loss accruals and the mitigating effects of audito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39 (2): 468–491.

Huang, K.-C., and Y.-C. Wang. 2023. How do investors underreact to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Evidence from Taiwan's corporate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89: 102782.

Jensen, M. C. 1993.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8 (3): 831-880.

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4): 305-360.

Jensen, M. C., and R. S. Ruback. 1983.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 (1-4): 5-50.

Kim, I., and D. J. Skinner. 2012. Measuring securities litigation risk.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3 (1-2): 290-310.

Kothari, S. P., A. J. Leone, and C. E. Wasley. 2005.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9 (1): 163-197.

Kothari, S. P., S. Shu, and P. D. Wysocki. 2009. Do managers withhold bad new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7 (1): 241-276.

Krishnan, G. V. 2003. Audit quality and the pricing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2 (1): 109-126.

Krishnan, G. V., and G. Visvanathan. 2008. Does the SOX definition of an accounting expert matt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directors' accounting expertise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5 (3): 827-857.

Li, H. 2023. Litigation-disclosure modifications in the 10-K: Large-sample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38 (2): 437–452.

Miller, G. S. 2002. Earnings performance and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 (1): 173-204.

Moh'd, M. A., L. G. Perry, and J. N. Rimbey. 1998.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on corporate debt policy: 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The Financial Review* 33 (3): 85-98.

Nilsen, K. 2011. Renewed focus on loss contingency disclosures: SEC official shines spotlight on limitations of AICPA-ABA treaty. *Journal of Accountancy* 211 (4): 37-39.

Pukthuanthong, K., H. Turtle, T. Walker, and J. Wang. 2017. Litigation risk and 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45: 342-359.

Ramadani, V., E. P. C. Chang, R. Palalić, and E. Memili. 2024. Governance in the family businesses. In Entrepreneurial Family Businesses: A Textbook on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Succession, with Case Studies (pp. 35-56).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chiff, J., A. Schiff, and H. Rozen. 2012. Accounting for contingencies: Disclosure of future business risks. *Management Accounting Quarterly* 13 (3): 1-8.

Sengupta, P. 1998. Corporate disclosure quality and the cost of debt. *The Accounting Review* 73 (4): 459-474.

Singh, M., and W. N. Davidson. 2003. Agency costs,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7 (5): 793-81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Skinner, D. J. 1994. Why firms voluntarily disclose bad new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2 (1): 38-60.

Treepongkaruna, S., K. Kyaw, and P. Jiraporn. 2024. ESG controversi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board size.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33 (5): 4218-4232.

Verrecchia, R. E. 1983.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 179-194.

Villalonga, B., R. Amit, M. A. Trujillo, and A. Guzmán. 2015. Governance of family firms.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635-654.

Watts, R. L., and J. L. Zimmerman. 1986.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Wu, S. F., C. Y. Fang, and W. Chen. 2020.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Taiwan.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41 (7): 1312-1326.

Yeh, Y. H., T. S. Lee, and T. Woidtke. 2001. Family contro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 (1-2): 21-48.

Yermack, D. 1996. Higher market valuation of companies with a small board of directo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0 (2): 185-211.

Zhang, H. 2020.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Litigation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Available onlin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514825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5148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